

马克思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批判及其时代意义

李包庚,刘云霞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

摘要: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繁荣假象,看到了西方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背后的虚伪本性,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予以深刻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大不列颠对华殖民暴行及其危害,辩证分析了大不列颠殖民行径对印度统治的双重影响,但是到晚年时期,他重新纠正了早期关于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肯定性评价,对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分析,深刻批驳了殖民统治在东方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马克思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批判,对当下我们警惕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具有警醒意义,也为今天抵御文化殖民主义与“和平演变”提供了理论武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大不列颠;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0)03-0001-08

马克思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批判,戳穿了帝国主义的虚伪本性,揭露了帝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的历史动机,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现实逻辑来看,“大炮送来文明论”“殖民推动进步”^[1]等观点曾引起关于马克思殖民主义论的诸多误解乃至偏见,有人甚至怀疑马克思的立场、态度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误解导致了思想混乱,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为此,有必要对马克思关于大不列颠殖民主义批判的理论予以深入研究,还原历史真相,肃清错误历史观的不良影响,为我们警惕时下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提供借鉴。

一、马克思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批判的背景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适逢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期,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工业革命。为了满足自身工业发展的需求,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竞相掠夺资源,抢占原料产地,占领世界市场。在大不列颠对大清帝国的往来贸易中,出现越演越烈的贸易逆差,导致西方国家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上涨,国家金银储备越来越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此起彼伏,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愈演愈烈。为了规避风险,扭转贸易逆差,转嫁或化解国内外因经济危机爆发的社

收稿日期:2020-04-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7ZDA003)

作者简介:李包庚(1970—),男,江西宜春人,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会矛盾,帝国主义开始将侵略的魔爪从“文明的故乡”伸向了世界各地,虚伪、野蛮的本性暴露无遗。以大不列颠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疯狂瓜分殖民地,加大殖民剥削与压迫,给亚非拉美等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灾难与痛苦。

马克思在中学时就曾立高远之志,“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2]。事实上,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不懈努力奋斗。1847年,马克思开始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联性,他指出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若想探寻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奥秘,必然绕不开对殖民主义的深度观察和研究。1848年大革命风暴之后,马克思根据变化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致力于研究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认为,要分析殖民主义的内在逻辑,就必须打破以往思维的局限性,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地域狭隘性,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和广度去分析问题。因此,对殖民主义进行深入的、批判性考察就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对殖民主义的深入研究考察中,马克思逐渐意识到“日不落帝国”区别于其他殖民国家的殖民活动的特殊性,看到了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即“一个是破坏的使命——消灭旧的亚洲社会,另一个是建设的使命,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3]。马克思指出,同其他殖民国家一样,大不列颠的侵略本质与掠夺本性毋庸置疑,同时大不列颠还在印度“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马克思对大不列颠的主要殖民地——中国、印度等国家特别关注。一方面,是出于揭露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不断扩张,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波斯巴布教徒起义、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印度民族大起义,吸引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各国人士的广泛关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最新变化和发展趋势。他们对中国社会情况的整体把握和深入思考,生动地反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等重要著作中”^[5]。马克思在接受查理·德纳的邀请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时,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短篇文章,他从大不列颠对华战争入手,围绕殖民主义者多次发动对华

战争的缘由及其过程、中国革命的世界性影响等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分析。马克思对印度的论述相对集中于1853年,他对印度沦为不列颠殖民地的根源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印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做了精辟剖析和深入论述。马克思甚至在晚年都未曾放弃对东方国家未来走向的关注。

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也是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需要。19世纪40年代,随着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普鲁士、奥地利、波兰、意大利等地相继爆发大规模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也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去,但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最后却惨遭失败,工人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在分析革命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过程中,意识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妥协性,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认识。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分阶段进行动态考察。17、18世纪,无产阶级力量尚小,不具备武装夺取政权的能力,故资产阶级仍然是革命的先锋与领袖,是革命的实际领导者,他们具有较强的革命性,此时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城市居民阶级还没有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单独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还可以联合农民、工人取得反对封建势力的阶段性胜利,它是一种新社会制度的胜利;到了19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场手工业的进步,无产阶级逐渐涌现出来,并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去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后来,两次法国里昂工人大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继爆发,大范围的革命运动爆发意味着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日趋激化,阶级矛盾正逐步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指出,社会阶级矛盾的变化必然导致资产阶级背叛工人、农民最终向封建势力低头而“实行反革命”“可怜的和狭隘的利己主义使得普鲁士资产阶级瞎了眼睛,以致它‘竟抛弃了自己必要的同盟者——农民’,并把农民这个同盟者‘变成了封建反革命手中的武器’,‘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民’。”^[6]

马克思对1848年大革命失败作了深刻总结,并将其与1648年英国革命及1789年法国革命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比较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社会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个全新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自由农民进入了普鲁士的历史”^[7],资产阶级仅有的少得可怜的革命性早

已消失殆尽,他们已经由17、18世纪革命的领导者变成了19世纪革命的背叛者,“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顾忌地出卖了这些农民,出卖自己天然的同盟者”^[8]。马克思因此得出结论,“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迟钝、畏缩、缓慢,以致当它以威逼的气势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抗的那一刻,它发现无产阶级以及市民等级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集团也以威逼的气势同它自己形成了对抗”^{[3]443}。要谋求德国的解放,关键“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3]15},即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担。这样的基本判断引导马克思将目光从欧洲转移到东方,他希望从东方社会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曙光。也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实现了从一名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二、马克思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批判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欣欣向荣景象,看到了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看到了资本逻辑对人的发展的制约作用。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在探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对殖民主义尤其是大不列颠殖民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深度的鞭挞。

1. 深刻批判了大不列颠在华的殖民主义暴行及其危害

马克思在《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中指出,整个欧洲将爆发一场金融危机,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在于金银的大量流失。白银作为亚洲国家的唯一交换媒介,其他国家要同亚洲进行贸易交往就必须把黄金换成白银,畸形的贸易活动导致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流向亚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逆差越发严重,直到鸦片贸易,才发生了明显转折。“后来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尘世往来的大门,金属货币流通才发生这样一个明显突出的转折”^{[5]17}，“于是,在1842年,现代贸易史上第一次真的发生了白银大量从亚洲运往欧洲的事情”^{[5]17-18}。

第一,揭露了大不列颠发动鸦片战争的动机。为了转嫁危机,扭转贸易逆差,大不列颠大规模地向中国倾销各种自产工业品,结果却收效甚微。最后,大不列颠为满足自己卑劣的资本家目的,采取了灭

绝人性的方式——走私鸦片。在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之后,以无比拙劣的借口一次又一次地策划对华战争。马克思不厌其详地引用了大量的公函、对外文件、数据资料、议会记录等等来揭露英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借口是多么不得人心,多么站不住脚。马克思说,“我们认为,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往来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9]17}“全部事情归结起来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岔子:没有把包括3名审明的罪犯在内的一群水手以隆重的仪式遣送回船”^{[9]19-20},帕麦斯顿当局甚至可耻地把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推卸给自己的部下,试图去混淆视听,欺骗公众,妄想以受害者的姿态来蒙骗群众,博取同情。

表面上看来,大不列颠发动战争是为了缓解欧洲本土的金融危机,扭转贸易逆差,为此,他们找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口来为自己的血腥暴行正名,甚至利用媒体来为自己开脱,“但是遗憾得很!帕麦斯顿派的报刊煞费苦心地制造和宣扬的那些最初印象太脆弱了,经不起真实消息的冲击”^{[3]816}。究其根本,大不列颠发动战争的根本动机在于帝国主义想要通过战争撬开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的那个“遍地是黄金”的未知世界的大门。换言之,他们想要掠夺亚洲丰富的资源、财产,免费利用中国、印度廉价的劳动力,将中国、印度等国家彻底打造成他们在东方的商品倾销地。此外,据马克思描述,19世纪,大不列颠国内阶级矛盾甚为突出,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帕麦斯顿内阁更是迫不及待地发动鸦片战争,他们希望通过资源掠夺和市场侵占来弥补经济不足,扭转贸易逆差,巩固其资产阶级霸主地位。因此,虽然鸦片战争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作用下爆发的,但其背后的根本动机其实在于帝国主义想通过掠夺亚洲的免费原料以及劳动力,抢占亚洲潜力巨大的商品市场,为本国工业发展积累原始资本。

第二,揭露了大不列颠殖民暴行造成的严重后果。马克思援引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世人揭露了大不列颠灭绝人性的殖民统治、鸦片贸易造成严重后果。针对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马克思指出,在中国“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3]793},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海盗式行为”“掠夺式行径”,恩格斯也义愤填膺地指出,“英国军人只是为了取

乐而犯下滔天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被宗教狂热所驱使,也不是由对专横暴虐的征服者的仇恨所激起,也不是因英勇的地方的顽强抵抗而引起的”^{[9]335}。在所有的论述中,马克思始终站在真理的一方,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一边,为正义发声,为我们有理有据地列举出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桩桩一件件罪证。马克思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同那些试图掩盖事情真相的暴行掩护者们据理力争。他指出,大不列颠的殖民统治导致亚洲的白银大量外流,各类不平等条约以及割地赔款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孱弱无力,一度爆发财政危机,人民因此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外,鸦片贸易导致中国国民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体质也深受损害。面对英国政府这种严重违反人类道义的残忍屠杀和血腥暴行,马克思痛心疾首、义正辞严地控诉道,“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9]93}。

2. 辩证分析了大不列颠殖民主义在印度统治的双重影响

马克思说印度保守的社会制度的崩溃,与其说是大不列颠士兵与税官的干涉,还不如说是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提出大不列颠将在印度完成“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与“建设性使命”。所谓破坏性使命,马克思表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3]849},马克思甚至引用英国爪哇总督的话指出,东印度公司对待它的臣民还不如种植场主对待自己的奴隶上心,种植场主好歹是付了钱的,而它只想着赚钱,却不想花费一毛钱地压榨自己的臣民,“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结合在一起”^{[3]850}。印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如饥荒、内战、外辱等等灾难,虽然看起来影响已经足够严重,但是,这些灾难在殖民主义者的暴行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没有任何重新重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3]850}。马克思说大不列颠人“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

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3]857}。虽然,从人的感情上看,亲眼看到这延续了千年的社会制度的土崩瓦解,不免令人唏嘘,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854}。

马克思分析道,大不列颠“重建的使命”是在上述一系列废墟上开始的。马克思通过对历史的总结指出,“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3]857},因此,不列颠对印度的胜利是先进文明的胜利,其在毁灭印度文明的同时,也将为印度社会带来一些积极性影响。马克思说大不列颠将使印度达到史无前例的、更加稳固的统一,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3]857}的印度社会的统一。此外,在英国人的监督下,印度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3]858}。大不列颠的蒸汽机将加速印度与世界的交往,把印度各个港口同外面联系起来,使其摆脱先前孤立的状态。“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3]858}。在马克思看来,大不列颠对印度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在摧毁印度经济基础的时候,将“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3]853}。但是,这场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3]861}。“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3]861-862}。

3. 重新纠正了早期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肯定性评价

如果说马克思早期关于大不列颠殖民主义在印度的统治还持有部分肯定性意见的话,那么,到晚年,马克思对殖民主义在印度的统治的态度只剩下了否定性的评价,他彻底推翻了早期关于大不列颠

殖民统治特殊性的看法。马克思晚期关于大不列颠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看法并非凭空产生,这一思想的转变有迹可循。促成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原因有四:第一,马克思撰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以及《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紧接着印度爆发了1857—1859年民族大起义,这一民族运动对马克思思想转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第一国际的成立使得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已经觉醒,这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而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这一想法。巴黎公社运动是法国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虽然这场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它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在总结反思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10]。第三,马克思对大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态度还受到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曾在1870年1月1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我在这里的一个图书馆终于发现一本普兰德加斯特的书,但愿我能得到它。我走运也罢,倒霉也罢,爱尔兰古代法现在要出版了,因此,我也得攻克它们。我研究得越深,我就越清楚:英国的入侵,使爱尔兰的发展丧失了一切可能性并使它倒退了几个世纪”^[11]。第四,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关于俄国公社二重性及其发展前景的系统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大不列颠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态度的转变。

马克思晚年关于印度社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以及“1879年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和1881年对菲尔的著作《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所作的摘要”^[12]等,马克思晚年关于大不列颠殖民统治对印度社会的作用持否定性意见,并对大不列颠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予以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如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马克思提到“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13]⁸³¹

在三稿中关于俄国公社马克思继续提出“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13]⁸³⁷。“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进行过让公社自杀的尝试;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饥馑更加严重”^[14]。此外,马克思在为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所做的摘要中亦提出“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衰落又使他们自己受到威胁”^[15]。马克思在为《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所作的摘要中也讲到,柴明达尔是英国的恶棍和蠢驴们造成的,这一说法与马克思早期提出的“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3]⁸⁵⁷说法是相悖的。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爆发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马克思对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分析,深刻批驳了殖民统治在东方国家造成的沉重灾难,进一步丰富了其殖民主义批判理论。

三、马克思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批判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批判,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殖民行径的丑恶嘴脸,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16]在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马克思对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批判,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1. 对认识当前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具有警醒意义

近代中国闭关自守的国家政策,致使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任何影响力。因此,清王朝才会屡遭割地赔款,被大不列颠以“站不住脚”的理由为借口发动战争,被其他联军趁火打劫,沦落为资本主义国家在东方的商品倾销地。1840年大不列颠对华发动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殖民地国家,苦难的中国人民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奴役与蹂躏,直到1945年才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殖民

主义的侵略控制,获得民族独立。在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反侵略斗争中,中国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要在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警惕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防止重蹈历史覆辙。“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是习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是中国人民饱受100多年血与火的战乱之苦得出的真理,是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概括,是对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启示。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必须捍卫到底。新中国成立,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已经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但是,“木秀于林”的成就已经形成了“树大招风”的局面,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引发了某些国家的不安,诸如“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论调不绝于耳,阻止中国的发展、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贸易保护主义等遏制战略成为他们的共识。对此习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没有殖民和侵略传统”“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16]。

随着旧有的资本主导的殖民体系的崩溃,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陆续走上世界舞台,整体实力也不断提升,其中,有不少国家跟随中国的步伐走上了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的变化令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武力征服的方式而谋求新的殖民手段。他们表面上承认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独立,背后却通过资本输出、科技垄断、金融垄断等经济“兼并”手段开展新一轮的殖民。他们恃强凌弱、以大欺小,或者假借经济援助之名,肆意谋取援助国的利益与特权;或者利用本国技术优势、经济优势,通过不合理的交换手段来谋取高额利润、进行技术敲诈、设置贸易壁垒,甚至对一些没有军事主导权的国家进行军事软殖民等。这其实是殖民主义在新时代变种,结果就是落后国家表面上获得了政治独立,实际上却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支持。审视当今世界格局,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西方发达国家总体占优势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改变。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与竞争的时期,掌握国际社会发展总趋势,抵制新帝国主义、

新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纠正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稳定安全的国际秩序,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我们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抵制所谓“丛林法则”,要在传承发展本国文化的同时,尊重世界各国文化多样性,制度多样化,不搞垄断独裁和霸权主义;应完善国际公约、协议,取消大国特权,提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世界贸易组织应进一步完善,尽量取消对发达国家的倾斜政策,提倡“公正贸易”和“自由贸易”相结合的新型国际贸易原则,避免沦为发达国家管理世界贸易的工具。

2. 为抵御文化殖民主义与“和平演变”提供了理论武器

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撑,它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19世纪的满清政府,因为腐朽、封闭僵化的政治制度难以抵挡大不列颠殖民主义洋枪洋炮的强大威力,最后沦为列强任意宰割的“羔羊”,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被迫大量割地赔款,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惨遭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与压迫。这样百年屈辱史是中国人民心中难以磨灭的痛,一部分国人甚至因这段历史而产生自卑心理,错误地认为中国技不如人、制不如人、文化不如人,处处落后于西方国家,似乎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圆;同时,大不列颠等帝国主义国家凭借长期形成的资本与科技优势,不断全方位侵略和掠夺中国等后发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但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从各个领域围堵中国,全方位“做空中国”“唱衰中国”,不断鼓吹“宪政民主”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试图在中国复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和平演变”悲剧,最终瓦解甚至肢解社会主义中国。于是,有些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开始崇洋媚外,甚至歪曲历史事件,否定中国革命史实,抹黑中国革命的英雄人物,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我们要坚决反对,因为“英雄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联,也更是因为今天处于一个伟大时代的中国对英雄的呼唤,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弘扬新时代英雄文化”^[17]。另外,有些人则无原则无底线地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才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正道”,从而否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有的人则错误地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真正的民

主,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封建专制的变种,如此等等,说到底都是文化上不自信的表现。正是文化上的不自信,导致一些人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的正确性,怀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与科学性。

毛泽东主席曾在1964年6月深刻指出,帝国主义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第三代、第四代青年,使社会主义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面对这样的图谋,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时刻不忘前车之鉴,特别要注意吸取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我们要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自信,全面深刻理解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历史逻辑,特别是要深刻理解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勇于创新,砥砺奋进,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境界,引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制度根源与道路根源,从而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坚决同各种错误或反动的社会思潮作斗争,防止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殖民主义;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让年轻一代人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牢牢守好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至关重要的阵地。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制度最本质的优势。因此,在新时代,要始终坚持党对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自觉增强“四个自信”。

3.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启示

马克思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告诫我们,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结构的改善,日益密切的世界普遍交往必然打破各民族间封闭隔绝的原始状态,每个国家都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当中。那么,任何国家、民族的发展将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最终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共同体”。“由于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

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脱离了他们的闭关自守状态”^{[3]299}。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与趋势是任何个人和集体都难以阻挡的、无法抗拒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我们愈发感受到超越民族之间意识形态隔阂的人类命运的休戚相关。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够独善其身,没有一个民族的进步可以不依靠他国,人类社会俨然成为一个“地球村”。全球化的世界局势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提供了便利,科技商品的殖民、文化的殖民、知识的殖民等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长期遭受大国的资本压制。审视当今世界,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总体占优势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改变,资本逻辑仍然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摒弃零和思维,谋求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俨然成为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民族的共同期望。

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交往格局,无论曾经创造怎样的辉煌,都只是为了满足小部分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的世界交往格局在本质上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是相悖的,它不符合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共同愿望,结果必然造成世界范围内的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矛盾与对抗。“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与‘异化’,加剧阶级矛盾”^[18]。故而,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形成合理有序的、符合世界发展一体化趋势的新的国际关系,必然需要跳出民族国家的“小我”,谋求世界范围内的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大我”价值,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高度推动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为了回应世界人民的这一共同需求,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伟大倡议,同马克思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理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启示,为坚决反对资本逻辑主导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警惕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理论生长点。换言之,在新时代中国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全球治理的价值追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于一个世界”^[19],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它主张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要求突破以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世界格局的总体性规定,被世界人民称之为“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当今世界发展一体化的总体趋势,回应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摒弃了零和博弈的畸形世界秩序观,向世界人民传达了实现全人类自由的坚定信念,为各国人民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世界性合力。

四、结 语

马克思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一方面,肯定了大不列颠殖民主义在客观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推进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尖锐地批判了殖民主义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和严重后果。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殖民主义暴行入木三分地揭露与批判,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为中国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18年以来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霸凌主义、单边主义行径。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中国和其他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人民勠力同心,奋勇抗疫,阻止了病毒的传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有些国家的政客把疫情政治化,置本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于不顾,不停“甩锅”,把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甚至做着各种“索赔”的美梦,使人仿佛又看到了鸦片战争的硝烟。万幸的是,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中国。1949年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砥砺前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谱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篇章。今天,中华民族以巍然之姿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20]。我们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实际的变化情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1]。

参考文献:

[1] 吴争春. 殖民岂能有功[J]. 湘潮,2019(4):27-30.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6] 谢霖. 东方社会之路[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7.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38.
[8] 列宁. 列宁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38.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4.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11.
[12] 李百玲. 马克思晚年关于印度研究的理论嬗变及其意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4):69-74.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7.
[15] 马克思.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94.
[16] 习近平.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N]. 人民日报,2014-03-30(002).
[17] 韩云波. 中国共产党人英雄观的形成与习近平对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创造性发展[J]. 探索,2020(2):172-182.
[18] 李包庚. 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 中国社会科学,2020(4):4-26.
[19] 习近平. 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N]. 人民日报,2015-03-29(002).
[20] 习近平.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9-10-02(002).
[2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59.

(责任编辑:许宇鹏)